

《福建文学》
精品小说选
(2012-2016)

没有 结尾的 故事

福建文学杂志社 编



海峡出版发行集团
海峡文艺出版社

落实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
推动福建小说从“高原”向“高峰”迈进

没有 结尾的 故事

福建文学杂志社
编

《福建文学》
精品小说选
(2012-2016)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没有结尾的故事:《福建文学》精品小说选:2012—2016/福建文学杂志社编. —福州:海峡文艺出版社, 2017. 3

ISBN 978-7-5550-1083-8

I. ①没… II. ①福… III. ①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044687 号

没有结尾的故事

——《福建文学》精品小说选(2012—2016)

福建文学杂志社 编

责任编辑 谢 曦

助理编辑 吴瑶华

出版发行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
海峡文艺出版社

经 销 福建新华发行(集团)有限责任公司

社 址 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14 层 邮编 350001

发 行 部 0591—83779150

印 刷 福建新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邮编 350011

厂 址 福州市福新中路 42 号

开 本 787 毫米×1092 毫米 1/16

字 数 280 千字

印 张 16.5

版 次 2017 年 3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550-1083-8

定 价 35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寄承印厂调换

目 录

烟花灿烂 / 刘庆邦 /1

把硫酸倒进去 / 杨少衡 /11

摇篮与坟头 / 陈希我 /53

角斗士 / 李师江 /99

脏犬 / 陈毅达 /124

桉树叶子的味道 / 李西闽 /156

让死者瞑目 / 晓 苏 /180

寻找慈恩塔 / 鸿 琳 /193

王固本的活人证明 / 李相华 /220

马桶 / 张遂涛 /247

烟花灿烂

◎刘庆邦

雪花漫天落，打工的人遍地走。打工这个词，和打工者一样流行。不管在北京干什么活儿，都可以用打工一言蔽之。在地下挖地道的，说是打工。在足疗馆里捏脚的，说是打工。哪怕是一个在居民小区扒垃圾桶捡破烂儿的妇女，有人问她，在北京干什么呢？她张口就来，打工，到北京打工去了。

杨南丰对打工这个说法不是很认同。打架才是打，打老婆才是打，工作就是工作，打个什么劲呢！他认为打工的说法既不准确，也不好听。杨南丰把自己在北京干的活儿说成工作，不管谁问他，他都说自己在北京工作，不说打工。如果有人想问得具体点儿，杨南丰的回答一点儿都不具体，反而更加笼统，他说嗨，为人民服务呗！这不得了，这样回答就有些大了，差不多让人想到了中南海，想到了新华门，问话的人就不敢再问。

别的打工者流动性比较强，几乎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，或是换三个地方都打不了一枪。杨南丰把自己与别的打工者相区别，一个重要的理由是，他的工作是固定的，工作场所也是固定的，打一枪是老地方，打一百枪，还是老地方。好比他把第一泡尿撒进一个便池里，撒一百泡尿，还是撒在那个固定不变的便池里。这一点一般的打工者做得到吗？做不到吧！有如此优越的条件吗？没有吧！

一到春节，大多数打工者就坐不住“钓鱼台”了，纷纷收起“钓竿”，回老家去过节。而杨南丰在北京工作八年了，每年都是在工作岗位上度过的，从没有回家过春节。为什么？他的工作岗位重要吗，首都人民离不开他吗！

过了腊八过祭灶，这年的春节眼看又要到了。春节不仅是一个时间概念，不仅是一个节点，它像是有着动员的力量，一说春节要来，人们都有些兴奋，有些坐不住便桶。夏天小孩子到柳荫公园的水塘边喂鱼，小孩子一把饼干投进水里，红、黄、白、青各色鱼等，便浮出水面抢吃的，把原本平静的水面搅成

了一锅乱粥。这就好比人们是水里的鱼，小孩子手里拿的饼干就是春节，小孩子一把“春节”投进水里，人们就慌了手脚，乱了阵脚。春节又不是春药，哪至于让人们变得这般模样！可是，不行啊，它的效果或许比春药还厉害，似乎比服了春药还让人来劲。春字下面两个虫就是蠢，于是有人甚至把春节说成蠢节，说一到春节人就变蠢。

杨南丰不会变蠢，越是过春节，他的头脑越清醒。怎么，难道他不过春节吗？不是的。大家的时间都是一样的，要过初一，都过初一，要过十五，都过十五，谁都不能逃脱到时间之外。只是呢，他过春节的办法和别人不大一样。他所站的是局外人的立场，所持的是冷眼旁观的态度，不管炮火连天，依然我行我素。举例来说，过春节期间，北京的人家，谁家不放烟花呢，谁家不放炮呢！过年不就是过个热闹吗，图的不就是发发声吗，不就是听个响吗。杨南丰不，他烟花不买，鞭炮不买；二踢脚不买，麻雷子不买；钻天猴不买，坐地炮不买，凡是一点就冒火花，一冒火花就炸的东西，一律不买。

儿子杨展给杨南丰打来电话，说要到北京过春节。他们父子好久没在一块儿过春节了，好久没在一起吃过年的团圆饭了，儿子一说出自己的想法，他就说好啊，欢迎你们来！但他随后又说，这个事情我还要和你妈商量一下，等商量有了结果，再答复你们。杨南丰所说的你们，指的是儿子一家三口，其中包括儿媳和孙女。儿子一家也没在老家农村种地，他们也走出了黄泥地，在老家附近的一座煤城工作、生活。杨南丰说是跟妻子商量，其实是先跟自己商量。好多事情都是这样，遇事都是先跟自己商量，跟自己商量得差不多了，再跟别人商量。他问自己：怎么办？

自己的回答：不好办。

怎么不好办？

不好办就是不好办，你自己还不清楚吗！

儿子提出来北京过春节，表明心里想着你，是对你的孝敬，你怎么能拒绝呢？

我也不想拒绝儿子一家到北京来，我也想趁过年享受点儿天伦之乐，可现实的难题摆在那儿，你让我怎么办呢？儿子一家来了，住在哪儿呢？大冷的天，总不能让儿子一家住在露天地里吧！

哎呀，你说的这个难题，的确是一个难题。衣、食、住、行，住排在第三位。人只要活在世上，总是要穿衣，总是要吃饭，总是得有个地方住，总是得行走。

孩子大老远地奔你来了，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，那是万万不可以的。

现成的办法，把你们两口子住的地方腾出来，让你儿子一家住，不就行了吗？

开玩笑，你怎么能想出这样的馊主意呢？打嘴，打嘴！

杨南丰与杨南丰商量的结果，是没有结果。

这就不得不把杨南丰从事的工作简单交代一下。他的工作不能说不重要，但并不复杂，技术含量也不高，也就是在一个人口密集的居民小区看守一间公共卫生间，并负责卫生间的日常保洁。这份工作的收入是稳定的，每月都能领到三千多块钱的工资。他在北京干了一段时间后，在他的召唤下，妻子也到了北京。妻子应聘在一幢高层居民楼打扫卫生，每月也能挣一两千块钱。那么，他们两口子住在哪里呢？卫生间里有一间值班用的小屋，小屋的面积就两平方米多一点，不到三平方米。小屋里能放下一张单人床，但不能放单人床，如果放一张单人床进去的话，人就没有下脚的地方了，进屋就得上床。他们的办法，是放进去一张简易的折叠沙发。白天立起一半当沙发坐，脚可以放在地上。夜里把立起的一半放下去，就变成了一张沙发床。两口子可以在床上睡觉，还可以干点儿别的什么。

这张折叠沙发不是杨南丰花钱去商场买的，是常年在卫生间门口一侧扎摊收购废品的老侯送给他的。老侯声称，他除了不收活人，不收海洛因，别的什么东西都收，都收得到。一张破沙发，等于是一块不易处理的垃圾，不值几个钱。老侯让杨南丰拿去用吧。杨南丰对老侯说了谢谢。老侯还有话说，他说：沙发床这么狭窄，你们两口子是不是每天晚上都要摞起来睡呢？杨南丰说：睡法各有千秋，这个你就不用管了。老侯想听听杨南丰的“千秋”是什么。杨南丰当然不会告诉他，杨南丰说：睡觉嘛，只要能躺倒，能伸开腿，能闭上眼，就行了，别的没什么。

卫生间再卫生，也是厕所。厕所在杨南丰老家叫茅房。人睡在茅房里，总归不太好吧。让老家的人知道了，恐怕会有人说闲话的。北京那么多房子，两口子租间房子住不好吗？北京的房子是很多，抬眼就是高楼，仰脸就是大厦。拿这个居民小区来说，除了杨南丰所看守的公共卫生间是平房，周围矗立的都是高楼。高楼高的有二十多层，低的也有五六层。杨南丰租间房子住好是好，可是，哪怕他租一间不怎么样的房子，一个月的租金也得好几千块呀！等于他把挣来的工资都砸在房租里还不太够。好不好，干工作等于白干，这不划算。金銮殿虽好，那是皇帝老儿住的地方，不是谁想住就能住的。

杨南丰把儿子要求来北京过春节的事跟妻子一说，妻子的态度倒是很明确，说好呀，正好我想我儿子了，也想我孙女了，我正想让他们来呢！妻子的样子不怕儿子一家来北京，像是害怕儿子一家不来北京。

我也想让他们来，可他们来了住在哪儿呢？

你想办法。

我想不出来。

你不是办法多嘛，平时吹得十个八个的，好像一肚子两肋巴都是办法。该你拿办法的时候，你肚子里什么都没有了，都变成尿了。

话不要说得这么难听好不好，我倒是想睡在梁头上呢，这里哪有梁头呢！

你干脆蹲在男卫生间里得了，你从里边把门一插，别人还以为你在拉一个大号的，老也拉不完呢！妻子禁不住笑。

我要是蹲在男卫生间，你就蹲在女卫生间。屎都快憋到屁股门子了，你还开什么玩笑！

妻子说：你不会去租一间房子嘛！

你说得轻巧，年底了，哪里有现成的房子等你租。等你租到了房子，年早跑得远了。哎，你这一说倒是提醒我了，楼上没房子，楼下面的地下室应该有房子。不少在地下室租房子的人回家过春节去了，肯定会有房子空下来。咱去那里租一间房子给孩子住，你觉得怎么样？

这就对了嘛！咱们辛辛苦苦出来挣钱为了什么，还不是为了孩子嘛！孩子高兴了，咱们就高兴。孩子不高兴，咱们也高兴不起来。

让他们住地下室，他们不会不高兴吧？

他们要是不愿意住地下室，我去住，让他们住卫生间。卫生间的香味我早就闻够了。

又开玩笑。

旁边两幢高层住宅楼下面都有地下室，物业公司把地下室包给了一个姓牛的东北女人，由老牛负责对外出租。杨南丰对老牛是熟悉的，因为地下室没卫生间，老牛也是卫生间里的常客。杨南丰找到老牛，问地下室有空房子吗？

老牛说没有。见杨南丰面带失望，她问：怎么的，你过年也要改善一下生活吗？

我生活挺好的，改善不改善无所谓。我儿子一家三口今年要来北京过春节，我得给他们找个地方住。

这个事情很重要，孩子奔你来了，没地方住可不行。

我看有的人拉着大箱子走了，他们都没退房吗？

没有，暂时还没人退租。过了春节，他们会回来继续住。

这可难住我了，没想到地下室的房子也这么紧俏。

老牛这才说了一个信息，有一个租户，租的一间房子到期了，没说继续租还是不租，房子倒是在那里空着。

柳暗花明又一村。杨南丰说：那就租给我吧。

老牛问他打算租多长时间？

杨南丰说：一个星期就够了，顶多租十天。

老牛说：那不行，要租的话，最少租一个月。

租一个月多少钱？

都是熟人，我给你优惠价，不跟你要一千了，你给八百就行了。

这么贵？

你要是嫌贵，咱就不谈了。你可以到房屋中介公司那里去看看，他们那儿的房子便宜。

杨南丰知道老牛说的是反话。中介公司挂出的房源都是地面上的楼房，哪套房子的租金不得三千、五千，哪有什么便宜可言！他只得咬了咬牙，把老牛说的价钱接受下来。

除夕的前一天，儿子一家到北京来了。这年的北京一冬天都没下雪，干天，干地，还有点干冷。儿媳两个耳朵上各戴了一支毛茸茸的球形的暖耳，把耳朵扩大得有些夸张。儿媳说：北京就是冷，冷死了。

杨南丰说：到了屋里就暖和了，屋里有暖气。他没有把儿子一家往他工作的地方领，直接把他们领到地下室去了。通向地下室的通道是一个长长的斜坡，往下面一看黑洞洞的。儿媳往楼上看了看，以为公爹是带他们往上走，往高处走，却原来，是带他们往下走，往低处走。儿媳有些不大乐意，脚下也有些迟疑，说：哟，是地下室呀！说着瞥了一眼自己的丈夫。

我本来想安排你们住宾馆，只是宾馆离我们上班的地方有点儿远，吃饭也不方便。杨南丰赶紧解释说，风吹不到地下室，地下里更暖和。

儿子杨展问：我妈呢？

你妈还上着班，她下了班就过来，不耽误给你们做饭。你们想吃什么，你妈就给你们做什么。

儿媳说：风是吹不到地下室，所以地下室里空气也不好。

眼看事情有些僵，杨展对妻子说：出门在外，不要那么多事儿。他要过妻子手里拉着的红色拉杆箱，一个人提两个箱子，带头向地下室走去。

地下室里租来的一间房子，杨南丰是按新房的样式布置的。床上的床单、被子，还有枕头，都是新买的，主色调都是粉红色。屋顶的灯泡一照，屋里的确有些新房的味道和温馨的气氛。加之墙上贴满了拆开的新年挂历，每一张挂历上都印有央视女主播的情影，好像她们都应邀到这里捧场似的。不过，除了这些表面的东西，屋子别的东西，都是杨南丰从老侯收购废品的摊点上租来的，或以极便宜的价格买来的，其中包括沙发、席梦思床垫、折叠饭桌，还有电视机、毛绒玩具什么的。儿子一家来北京是临时性的，住几天就走了，什么东西凑合能用就行了，没有必要花那么多钱买新家具。

儿媳把房子看了看，只说了一句连个窗户都没有，对房子里的东西倒没有挑剔。她把床铺按了按，按出床铺有一些弹性，就在床边坐下了。

杨南丰老家过春节的传统，对大年三十，也就是除夕，格外重视。除了请灶神，贴门神，贴春联，有什么好吃的，也都是集中在除夕那天吃。北京人对过除夕也很重视，放烟花爆竹，包饺子，吃团圆饭，守夜，所有辞旧迎新的仪式都是在除夕之夜进行。加上电视台有一个一年一度的春节联欢晚会，人们不知不觉间就把自己和“联欢”捆绑在一起，不熬到把新年的钟声敲响，就好像对不起自己。在杨南丰的安排下，妻子把除夕的晚饭准备得相当丰盛，别的凉菜、热菜不说，仅具有家乡风味的扣碗儿就蒸了六个，扣碗儿包括条子肉、小酥肉、黄焖鸡、大块鱼、牛肉丸子等，一闻香味，就唤起了大家对家乡的记忆。杨南丰买了一瓶北京二锅头，要和儿子喝两杯。他知道妻子、儿媳和孙女都不喝白酒，专门买了一瓶大可乐，准备让她们以可乐代酒，届时全家人共同碰杯。要不是碰杯前出现一点不愉快，他们家过的应该是一个欢乐祥和的除夕。

不愉快的焦点出现在是放炮还是不放炮的问题上。

酒斟满了，可乐也倒上了，杨南丰端起酒杯，刚要以家长的身份说几句吉利话，儿媳说：爸，咱家还没放炮呢！此刻，外面已是炮声不断，炮火连天，整个北京城开始沸腾起来。他们一家虽然在地下室的封闭空间，虽然看不见烟花开放，但隆隆的炮声仍可以通过地面的震颤，传导到他们的耳膜。

老家的规矩，除夕的晚饭开饭之前，也要放上一挂鞭炮。但这是在北京，不是在老家，杨南丰说：咱家不放炮。

为什么？儿媳的样子有些惊奇。

我来北京七八年了，过春节从来没买过炮，也没放过炮。

儿媳还是问：为什么呢？

杨南丰没解释为什么，他说：咱们先吃饭，等有空的时候，我再跟你们说。

儿媳不举杯，她说：哪有过年不放炮的，连个炮都不放，那还叫过年吗！

这一次杨展没有指责妻子多事儿，他似乎同意妻子的观点，过年是要弄点儿烟花爆竹放一放。平时没有放的机会，过年不放啥时候放呢！

有人给儿媳打来了电话，儿媳接电话声音很大：喂，喂，我听不清你说的啥，你大点儿声好不好。我在地下室，可能是我这边信号不好。跑地下室干什么？你问我，我也不知道。什么什么？你等等，我出来了，我到外边去接。儿媳把手机捂在耳朵上，起身朝门外走去。

电视里在预报，春节联欢晚会很快就要开始。电视机是老款式，荧屏有点儿小。电视的信号也不好，荧屏上不时有“雪花”飘过。说是“雪花”吧，又像是放烟花棒时爆出的“火花”，每一朵“火花”开放时，电视机都会“嗞啦”一下，放出难听的噪音。

杨南丰手里的酒杯不知放下好，还是继续端着好，他对儿子说：以后吃饭的时候最好不要接电话。一个人接电话，一家人都得等她。

儿子说：可能是她妈打来的电话，她不接也不好。要不咱们先吃吧，不用等她了。

杨南丰说：那可不行，吃团圆饭嘛，一个人都不能少。

妻子说：看看，我说让你买点儿炮，你就是不买，吕欣不高兴了吧！

杨南丰这才把酒杯放下了，他放得稍稍有点儿重，以致杯中的酒溢出了一些。放下酒杯的同时，他皱起眉头瞥了妻子一眼，他的意思是警告妻子，大过年的，不要埋怨他，免得惹得他不痛快。

等了一会儿不见儿媳回来，杨南丰说：一个电话怎么打这么长时间！他让儿子出去看看儿媳，让儿媳快点儿回来。

孙女年年说：我也去找妈妈！

杨展拉着女儿的手，一块儿到外面找吕欣去了。

房子里留下了老两口。桌子上摆着一桌子菜，还有酒，还有可乐。可两口子都乐不起来，有些面面相觑，一时无话可说。对过年放炮的事情，杨南丰是懂得的。从年三十到大年初一起五更，至少要放四次炮。除了除夕吃晚饭前要

放一次炮，睡觉时要放关门炮，起床后要放开门炮，吃新年第一顿饺子时还要放贺新春的炮。关门炮和开门炮，放的都是散炮，放三声就行了。而除夕辞旧日的炮和初一迎新的炮，放的都是鞭炮，响声持续的时间长一些。在老家时，杨南丰是很爱放炮的，关门炮和开门炮差不多都是由他亲自放。特别是放开门炮，那是有些讲究的。村里谁家起得早，谁家起得晚，一听开门炮就知道了。开门炮规定的是三声，如果只响了两声，或者只响了一声，那就不好了，就显得不太吉利。所以他每次放开门炮时，口袋里都会多预备一枚到两枚炮，如果有的炮因质量问题成了哑炮，他会及时把备用的炮点上，使开门炮达到圆满的效果。有一次放开门炮时，他所点燃的三枚炮只响了两枚，等于只把“门”打开了三分之二。这可不行，他绝不能让邻居听见他家的开门炮只响了两声，也不能让家人在期待中只听到两声炮就完了。亏得他还预备着炮，他赶紧把炮从口袋里掏出来点燃，才使三声炮没有缺声。不管放哪种内容的炮，在老家都有听众，也有观众。在北京放炮，他的听众是谁呢，他的观众又在哪里呢？放了炮村里人都不知道，他不是等于白放了吗，钱不是等于白花了么？北京有钱的人那么多，买起炮来车拉车载，放起炮来排山倒海。就算他也买点炮来放一放，恐怕连大海中的一个浪花都激不起来，就被起伏的波涛淹没了。为避免被淹没，最好的办法，是一个炮都不放。北京人放炮，他们当一个旁观者就行了。

杨展领着女儿找到吕欣，见吕欣已接完了电话，正在外面看北京人放烟花。那是居民小区的一个花园，花园里有一块圆坛形的空地。居民们把成箱的烟花从楼上抱下来，或用大号的塑料袋子把烟花提下来，你方放罢我登场，都在那块空地上燃放。因烟花的种类不同，燃放的烟花由低到中，由中到高，形成了一种立体的效果。在低处燃放的是鞭炮。把一盘五千头或一万头的鞭炮在地上伸展，将鞭梢的捻子点燃，一条火龙便在“噼啪”声中蜿蜒而去。处在中间位置的是一种会喷花的烟花。金花银花往上喷得有一树高，如同一棵棵开满鲜花的花树。在高处开放的烟花，是用一种助推的小型火箭打上去的。在夜空的背景下，可见一个个蝌蚪一样的红点儿，拖着长长的尾巴，在迅速向高处攀升。当红点儿升到一定的高度，高过了二十多层高的居民楼，随着“嘭嘭”的巨响，绚烂的五彩烟花霎时间布满天空。杨展对吕欣说：电话接完了，你怎么还不回去？咱爸咱妈都等着你吃饭哪！

吕欣说：吃饭没那么重要，放炮才重要。

大过年的，不要闹情绪，闹情绪对谁都不好。

谁闹情绪了？我看你爸就是抠门儿。

不知杨展在吕欣的耳朵边说了什么，吕欣说：放屁，我才不稀罕你的炮呢！

好老婆，给你老公点儿面子嘛！好了，走吧，乖，回去吃饭吧。想放炮，老公明天给你买。

咱们来到这儿，炮就该由他们买。

没问题，我跟老头儿说说，让他给你买。

什么给我买，这话我不爱听。难道你不喜欢放炮吗！

说话间，又一枚烟花弹在夜空中炸开。这枚烟花道法自然，模仿的是蜜蜂乱舞的景象。刹那间，仿佛有一万只金色的蜜蜂箭一样上下翻飞。不知“蜜蜂”采到蜜没有，“蜜蜂”散去后，却见空中飘起一只只绣球样的小灯笼。杨展承认，是挺好看的。

杨展一家三口回到地下室，杨南丰不再说祝年的话，只说好，喝酒喝酒，吃菜吃菜！他用筷子指点着，让儿媳吃这个菜，吃那个菜，说这个菜很好吃，那个菜也很好吃。他问孙女：在北京过年好吗？

孙女说：好，天上有小灯笼。

明天早上别忘了给你奶奶拜年，你奶奶好给你发压岁钱。

发多少？

这个先不能告诉你，等你拜了年就知道了。

奶奶是不是要给我发一万块钱？

奶奶咦了一声，说你这个小财迷，你的口比狮子的口还大。

杨南丰等着儿子、儿媳给他敬酒，祝他新年吉祥。儿子、儿媳迟迟不向他敬酒，他只好自己倒酒，自己喝，对儿媳说：你给你爸你妈拜年的时候，替我向你爸你妈问个好，就说我随时欢迎他们到北京来。

儿媳说：他们不愿到北京来，他们听人家说，北京的空气质量不好。

杨南丰本来想说，北京的空气质量是不太好，平常日子还好一些，过年一放炮，空气污染得就更厉害。话到嘴边，他又咽了回去。炮这个字眼目前来说是敏感的，他要是一提放炮，儿媳可能又会不高兴。好像儿媳的肚子里装着不少炮，炮的捻子都支棱着，捻子一点就会响。他只含混地说了一句，天安门还是不错的，值得去看一看。

地下室里住有不少人家，有的人家是放炮的，他们嚷着放花喽，放炮喽，热热闹闹从杨南丰租的房子门口走过，一走出地下室的出口，就在出口前面的一块空地上放起炮来。因离地下室比较近，震得电视里说相声的演员似乎都成

了哑巴，只见比画，听不见说的是什么。

儿媳又把问题提了出来：地下室里住的都是外地人，人家怎么放炮呢？

看来这个问题是绕不过去的，杨南丰郑重地说：吕欣你放心，等哪年咱们一块儿回老家过春节，我买上上千块钱的烟花爆竹，在村里好好放一放。我要让村里人看看，你爸这些年在北京干得还可以。杨南丰听说了，这些年外出工作的人春节回老家，放炮放得很厉害，简直把村子当成了放炮的比赛场，看谁家的炮放得大，放得响，放得花样儿多，放得时间长。放炮放的是面子，也是气势，谁都想把面子搞得宽一些，把气势弄得大一些。

吕欣还没说话，杨展抢先把自己的观点说了出来，杨展说：爸，你说的都是老皇历，人到哪儿就该说哪儿的话。咱放炮，是放给自己看的，不是放给别人看的。咱放炮是为自己高兴，别人的态度无所谓。你和妈在北京干了这么多年了，怎么就不能放放自己的炮呢！

杨南丰说：你说放炮是给自己看的，那不可能。房子里又不能放炮，你只要到外面放炮，别人就看得见。

谁想看，就让他看嘛。你看北京人放炮，也可以让北京人看看你放的炮嘛！我们刚才就看了一会儿人家放的“天女散花”，看得我心里直痒痒。

吕欣说：就是，就是。

年年说：我也要放“天女散花”。

妻子说：买，买，明天就买。只要孩子高兴，花多少钱都没什么。

杨南丰思想上还没转过弯儿来，还在为自己辩解。他说：不是花多少钱的问题，我还考虑到，负责在小花园里清理垃圾的是我的一个朋友老于，每年除夕过后，小花园里留下的炮壳子多得都下不去脚。老于夜里两三点就开始清理，到天亮还清理不完。我不放炮的意思，也是想为老于减轻一点儿负担。

年初一上午，杨展一家三口到附近的地坛公园去赶庙会。从庙会上回来，杨展把吕欣、年年送回地下室，自己到街边的烟花销售点买了一大塑料兜子烟花爆竹，提到卫生间爸爸值班住的小屋里去了。杨展对爸爸交代：你对吕欣和年年说，就说这些烟花爆竹是你买的。

杨南丰说：那我给你钱。

儿子说：你给钱，我就要。你不想给，也无所谓。

本文刊于《福建文学》2015年第4期。

把硫酸倒进去

◎杨少衡

那时候还没有微博微信什么的，也没有那么多的手机照片和举报。那时候吃啊喝啊不算个大事，客人到了桌边，桌上摆个一瓶两瓶酒，那是起码的。那时候餐桌上流行酒段子，掺和着各种黄段子，吃起来大家哈哈哈哈哈，有荤有素，五味杂陈。

可是那时候迟可东已经不喝酒了，几乎是滴酒不沾。倒不是人家先知先觉，只因为他天生的酒精过敏，喝酒对他有如受刑。迟可东虽然自己不喝，却也入乡随俗，该摆酒就摆酒，该举杯就举杯，让别人喝，他自己做个样子。如果他不仅做个样子，还认真起来，那千万得小心，他会让这个灌那个，要那个灌这个，搞得一桌很热闹。其间他在那上头正襟危坐，不动声色看着，“众人皆醉我独醒”，脸上表情高深莫测。

他管这叫作“化验”。他说酒精可以视同“溶剂”，类似于硫酸。把一块矿石样品磨成粉，放进实验杯里，把硫酸倒进去溶解试样，加入试剂并加热，观察其反应和结果，这是化验的基本过程。饭桌边的诸位一旦进入该过程，当然就视同“样品”了。

李金明当初作为“样品”进入化验之际，给迟可东留下了一点印象，该印象味道不佳，酸不拉叽。其时迟可东还不知道李金明的名字，不清楚此“样品”姓甚名何，只记住了他的表现：“现场直播”，也就是当场呕吐。该同志的呕吐物气味极重，掺着稀里哗啦一堆食物碎，其中以大小不一的线段残渣为主体，这些残渣来历可疑。

那天晚餐本来不该有酒，因为迟可东行前交代了八个字：多看少说，接待从

简。所谓从简也就是别搞复杂，吃饭不喝酒。负责此行安排的秦健却自作主张，让乡里头头往桌上摆酒。迟可东临上桌前才得知，即查问这是怎么搞的。秦健解释说此前几天没有，此后几天也不必，整个调研过程，只今天例外。迟可东追问今天为什么例外？秦健强调眼下就本县而言，今天这个日子比较重要。迟可东听罢摆摆手，不予肯定，也不再反对，于是酒就上了桌。乡里头头为了表示热情，拿出两瓶茅台，迟可东问：“这酒是你们乡制造的吗？”答案当然不是，本乡尚无能力伪造国酒。迟可东便让他们把茅台撤下，换成本乡制造。所谓本乡制造就是乡间家酿米酒，当地俗称“红壳酒”，原料是本地产糯米，加上本地产曲种酿成，该曲种颜色偏红，酿成的酒呈暗红色，就其性质而言很绿色很环保，好比山间野鸡生的小个子野鸡蛋，其性温补，适合女人坐月子使用，男人用一用也不错。

迟可东表态：“就这个。”

他批准众人前来敬酒，原则很简单，谁敬他谁喝掉，他不喝。期间免不了有人趁着酒兴力劝，请领导给个面子，那比较公平。迟可东岿然不动。迟可东一看就是那种嘴上话不多，心里很有数的人，类似场合众星拱月，他是中间被拱的大月亮，有权制定规则，众星星可以稍事起哄鼓噪，最终还得听他的，按他的不公平原则进行。

然后李金明扛着一口大缸冲上前来。在当天上阵的几个人中，李金明出场时间较后，人颇不起眼，亦有点怪，这个人身材偏矮小，身子比较单薄，头发有点乱，长了个大头，戴一副眼镜。他使用的酒具与众不同，别人用啤酒杯，或者用小碗，他拿了个刷牙杯那样的大杯，在类似场合有如大缸，满满倒了一缸，捧着上来敬酒。当晚用餐地点在乡政府食堂，食堂里合适的杯啊碗啊多得很，未必是本乡制造，却也有乡间特点，足够李金明选用，但是他偏用那么一个大型酒具。迟可东拿自己的酒杯跟李金明的大杯碰了一下，眯起眼睛看该小个子怎么表现，敢扛着这么一口大缸上来，未必真可以都灌下去。李金明并未劝酒，也没有祝词，什么话都不说，只是喝，众目睽睽之下咕嘟咕嘟几大口，一饮而尽，随即拎着他的酒具转身走开。刚转过身，他就喉咙一梗，“哇”的一声，“现场直播”，吐了一地。还好此前他恰巧转过身，否则就不是一地稀烂，该是满桌酸臭了。

迟可东不动声色，交代道：“让他去醒醒酒。”

当晚的“直播”过程大体如此，味道略重，并没有太出彩，可以让迟可东留

下一点印象，却不足以因此牵挂。他记住了一个用刷牙杯喝酒的家伙，小个子，其酒具之大与身材不成比例。该同志究竟是谁他却没记住，席间主人当然曾提到李金明的名字，迟可东未曾在意，确实也不需要为之太在意。

那时候迟可东刚从省里下到县里，人们只知这个人有来头，却不清楚其厉害。迟可东到来之初被任命为县委副书记，排老三，居书记、县长之后，这一安排是否别有意味？不需要有太多内部渠道，稍懂点门道的人都能猜想：人家只是戴了一顶临时便帽，正式的帽子不是那个。迟可东下来之前已经是省发改委的处长，空降任职肯定要做主官，不当县长就当书记，只等现有老大老二挪出一个位子。迟可东提前来到本县看住位子，虽然只是先戴一顶临时便帽，却也不能只在一旁玩那帽子，坐等其位，必须尽快进入状态。进入状态少不了下去调研一项，也就是到所属乡镇走一圈，了解各方面情况，接触各类“样品”。新任领导下乡调研，自然需要有熟悉情况的合适人物陪同协助，于是迟可东身边就跟上了一个秦健，秦健时任县委办副主任，干这种事轻车熟路，知道怎么服务领导。下乡之前秦健专门请示迟可东此行有何交代？迟可东就交代了那八个字：“多看少说，接待从简。”秦健表示领会，然后继续请示，说迟可东到任后第一次下去调研，底下同志想表示表示也在情理之中，怎么办呢？迟可东即明确指示：“表示表示可以，不要上酒。”

结果还是有一个例外，起于秦健自作主张，上了红壳酒，导致一个“现场直播”。当晚的红壳酒及相关“直播”均语焉不明，从开喝直到结束，众下属不停地敬酒，都只知道敬领导迟可东，却不知道这桌酒后边其实还有一个很具体的名目。那究竟是个什么？只有当事人迟可东，以及自作主张的秦健明白。

那是在河源乡，本县西北最偏远且最贫穷的乡镇。按照原定计划，迟可东在该乡待了一天，了解相关情况，当晚“例外”喝酒，然后在乡政府的客房住下来过夜。隔日清晨迟可东早早起床，下楼，秦健已经在楼下门厅等候。

“迟书记起得早啊。”他招呼。

迟可东说：“你更早。”

秦健称自己其实挺懒，他是听说迟可东喜欢早起散步，昨晚特地给手机上了闹钟。

两个人走出乡政府大门，拐上一条土路，前边忽有动静：“哇啊”，其声颇不雅，不是乌鸦叫唤，是人在呕吐，那股酸味儿再次扑面而来。

居然还是昨晚的那位，小个子。他在前方一棵树旁，扶着树干站着，弓起